

灵活中的坚定:从《晏子春秋》 看晏子的社交艺术与社交思想^①

贾海鹏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摘要:晏子十分擅长处理与别人之间的关系。平时,对一般同僚,他以诚相待,“和”字当先;对谗佞邪人,晏子的态度经历了一个先疏、后亲、再疏的曲折过程;对自己的家臣,他严格要求与鼓励谦逊并重。非常之际,晏子处理同僚关系时既立场坚定,又方式灵活。他与晋国叔向互相敬重,坦诚以待,共同创造了春秋外交史上的一段佳话。但是,由于齐文化重实践特征及自身尚节俭品格的影响,他对孔子排斥的多,赞许的少。晏子对待布衣百姓总是和颜悦色,折节谦逊,救贫济难,如闻已过,立即改正,从而得到了众人的尊敬与报答。晏子的社交方式虽灵活多变,但其目的却坚定不移,主要是为了尽可能团结好所有群体,安定社稷,扬威诸侯,这充分体现了他作为“社稷之臣”的本色。

关键词:《晏子春秋》;晏子;社交艺术;社交思想

中图分类号:K225.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99(2016)06-0089-08

晏子(约前578年—前500年),氏晏,名婴,字仲,谥平,春秋末年齐国夷维(今山东高密)人,曾历任灵公、庄公、景公三位君主,显名诸侯。作为三朝元老,一代贤相,晏子十分擅长与别人交往。他常常会根据不同的环境条件,对不同的人,采取既坚持原则、又灵活多变的交往方式。这让孔子钦佩不已,赞叹道:“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1]。《晏子春秋》是一部以记述晏子言论事迹为主的先秦典籍,其中就有许多关于他高妙社交艺术的记载。本文拟对此进行详细探析,以求教于方家学者。

一、与本国同僚交:不同官吏施以不同处世之道

对为官者而言,与同僚和谐相处既是生存之道,也是晋升之途。春秋末期,礼崩乐坏,为了争权夺利,各诸侯国的朝堂上矛盾重重,官吏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而处于“田氏代齐”前夜的姜氏政权尤其如此,这就决定了晏子与本国不同官吏之间的关系亦复杂多变。

1. 对一般同僚以诚相待,“和”字当先

普通官吏往往是一个政权的主体,是维持国家各项职能正常运转最重要的力量,故在晏子的为政生涯中,他十分注重与这些同僚搞好关系。上至公卿贵族,下逮基层小吏,晏子都以诚相待,“和”字当先,努力创造一种和气团结的氛围,在增强朝廷群臣凝聚力的同时,也使自己避灾免祸。

子尾,作为姜齐公族成员,曾被晏子称许为“惠”^{[2]943}。据《晏子春秋·内篇·杂下·子尾疑晏子不受庆氏之邑晏子谓足欲则亡第十五》(下引该书仅注篇名)载,庆封逃亡后,众人瓜分了他的采邑,把郕殿分

收稿日期:2016-06-12

作者简介:贾海鹏(1984—),男,山西高平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史博士生。

① 因笔者另有专文探究晏子与齐君、田氏、别国君主的关系,故本文仅讨论晏子与除齐君、田氏、别国君主外的其他人之间的交往。

给了晏子,却被晏子婉拒。子尾不解,问道:“富者,人之所欲也,何独弗欲?”面对自己平日赞许之人的疑惑,晏子抛出了他高妙的处世哲学——“幅利论”。晏子认为富就像布帛有幅一样,要为其制定限度,使之不能随意变更。每个人都想过优裕富足的生活,然而如果追逐利益过了头,则很容易伤害到自己,所以需要端正道德作为幅度。这在自辩的同时,也深深感染了子尾,使他对所得封邑“受而稍致之”^{[2]853},从而让景公觉得他很忠诚,更加宠信。我们不难想象,经过此事,子尾对晏子一定既佩服,又感激。

高、国二族为齐之世卿,历代均荣显有加。然高昭子对晏子的为人似乎有所怀疑,曾直言不讳地问道:“子事灵公、庄公、景公,皆敬子。三君之心一耶?夫子之心三也?”(《重而异者第十九》)面对如此不太礼貌的质疑,晏子先是称赞曰:“善哉问!”以缓和当时的尴尬气氛,接着耐心地解释了“一心可以事百君,三心不可以事一君”的道理,最后用十分谦逊的语言表明其实自己在灵、庄、景公三朝并没有很好地匡正君过,只不过仅能保全性命而已(甚至在景公朝都不一定能得到善终)。这不但展现了自己谦虚的品质,而且化解了两人之间可能产生的矛盾,维护了同僚之间的情谊。

晏子不但对公室和世卿成员坦诚谦逊,而且对其他同僚也尽力关照。

由于晏子在当时以博学睿智出名,故很多同僚都会向他请教人生和仕途当中遇到的困惑。柏常骞就是其中一位。

《问下第三十》载,柏常骞“去周之齐,见晏子曰:‘骞,周室之贱史也’,不量其不肖,愿事君子”。可见,他原先在周王室任职,后来才到齐国为官。而且从其说话的语气当中我们似乎可以推断出,他刚到齐国不久,即因仰慕晏子大名,遂专程请教。柏常骞询问的是“正道直行则不容于世,隐道危行则不忍。道亦无灭,身亦无废者,何若?”从其不忍“隐道危行”,想要做到“行道保身”来看,他还是一个有良知的官员。故晏子称赞曰:“善哉!”然后,很真诚地从事君处世的哲学角度告诫他“执一浩倨,则不取也;轻进苟合,则不信也;直易无讳,则速伤也;新始好利,则无不蔽也”,即固执地坚持傲慢的态度不可取,随便顺从以求晋升不诚信,简单率直不知避讳容易受到伤害,改变常规,标新求利,则没有不失败的。晏子还以“养世之君子”的标准鼓励他要“从轻不为进,从重不为退,省行而不伐,让利而不夸,陈物而勿专,见象而勿强”,也就是说做困难的工作不是为了当官,做容易的工作不是为了隐退,省察自己的行为而不矜伐,谦让利益而不夸耀,对上级述职而不独断专行,对下级公布法令而不强制执行,这样可使“道不灭,身不废矣”。由此可见晏子对下级同僚的推心置腹和殷殷以待,以期柏常骞成为智士忠臣,佐助自己治国理政。然而,柏常骞后来为了获得景公的宠信,竟然妄言能够增加君主的寿命,其征兆是地震。景公对此很高兴,“令百官趣具骞之所求”(《杂下第四》)。柏常骞出门,在路上遇到了晏子,相互行礼后,他主动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晏子。晏子以自己的博学揭穿了他的谎言,但并没有向景公报告,更没有惩罚他,只是说:“为之无益,不为无损也。汝薄敛,毋费民,且无令君知之。”这既让柏常骞意识到国有大贤、君不可欺,又保全了他的性命,让其对晏子既敬畏,又感恩。

《重而异者第二十一》中也有相似记载,不过主人公换成了“太仆”(仅有官职,没有姓名,不知是否指柏常骞)。他对景公说能让大地震动,后景公召晏子而问曰:“地可动乎?”晏子虽心知肚明,却并没有在君主面前揭露太仆,而是“默然不对”,出来对他说:“吾言之,恐子之死也;默然不对,恐君之惶也。子言,君臣俱得焉。忠于君者,岂必伤人哉!”晏子此举,既解除了景公的不安,又保全了太仆的性命。换句话说,既维护了君臣大义,又增进了与同僚之间的感情。另一个同僚陈子阳听闻后,深为感慨,他赞叹道:“晏子,仁人也,可谓忠上而惠下也。”

此外,晏子还曾力谏景公赦免了史固、祝佗、圉人、刖跪、烛邹、羽人等小吏的罪行,从而赢得了下层官吏的感激与爱戴。

如上所述,国家日常事务的有效处理离不开这些官吏的努力,晏子与他们处好关系,能够保证社会的稳定,保障百姓的生活。

2. 对谗佞邪人先疏、后亲、再疏

学界普遍认为一向以“社稷之臣”自居的晏子与谗佞邪人之间势如水火，矛盾不可调和。对此，笔者不以为然。晏子对待谗佞之人的态度应该有一个微妙而曲折的变化过程。因《晏子春秋》中的馋人以梁丘据为典型，故接下来我们就重点剖析一下晏子与他的交往。

景公即位初期，意气风发，常有复霸之志。晏子在这位新君身上似乎也看到了一些希望，出于自身正直耿直的品格，他常常建议景公除去身边的谗佞。如《谏下第十五》曰：

景公为西曲潢，其深灭轨，高三仞，横木龙蛇，立木鸟兽。公衣黼黻之衣、素绣之裳，一衣而五采具焉，带球玉而冠且，被发乱首，南面而立，傲然。晏子见，公曰：“昔仲父之霸何如？”晏子抑首而不对。公又曰：“昔仲父之霸何如？”

当晏子批评他的邪僻行为时，为了掩饰自己的过错，景公把责任推到了梁丘据和裔款身上。晏子听后，顺势言道：“夫二子营君以邪，公安得知道哉！且伐木不自其根，则蘖又生也，公何不去二子者，毋使耳目淫焉。”然而，令晏子失望的是，景公并没有听从他的劝谏。后来的事实也一再证明，景公不是贤明之君，他根本就离不开这些谗佞之人^①。《杂上第十二》载，景公深夜饮酒，先移于晏子和司马穰苴家，欲与之同乐，却被二人以大义婉拒。后他又到梁丘据所，“据左操瑟，右挈竽，行歌而出。公曰：‘乐哉！今夕吾饮也。微此二子者，何以治吾国？微此一臣者，何以乐吾身？’”对此，君子评价道：“景公两用之，仅得不亡。”

晏子是何等聪明之人，他逐渐看清了景公的本性。如果仍然坚持让君主杀掉谗佞，非但结果不会如愿，还可能引起景公的不满和奸邪的陷害，那样于己于国都十分不利。所以晏子调整了策略，虽然在日后的从政生涯中出于社稷之臣职责的考虑，仍多次在君主面前贬斥以梁丘据为首的谗佞之人，但却不敢贸然采取措施除去他们，而且还与梁建立了较为融洽的私人关系。晏子此举，一方面出于无奈，另一方面也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增强齐廷上下的凝聚力，以实现自己保国安民的理想。既然不能除掉谗佞，那么与之和平相处，至少在平日的政治生活中可以免去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和阻碍。晏子态度的转变，也让梁丘据颇为感激。《问下第二十九》载：“梁丘据问晏子曰：‘子事三君，君不同心，而子俱顺焉，仁人固多心乎？’”此处，我们看到的不是梁丘据对晏子为人的质疑，他更像是在向晏子求教事君的智慧。有趣的是，梁丘据称晏子为“仁人”，可见晏子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之高。《重而异者第一》中亦有相似记载，梁丘据曰：“仁人之耳目，亦犹人也。”让人值得注意的还有一个细节，本章中景公听了晏子关于礼治的言论后，曾说：“寡人不敏，无良左右淫蛊寡人，以至于此，请杀之。”晏子答道：“左右何罪！君若无礼，则好礼者去，无礼者至；君若好礼，则有礼者至，无礼者去。”在这里，他竟然为梁丘据开脱罪名。虽然国家大政的决定权主要在君主，但是他完全可以先顺着景公的意思，趁机杀掉平日所厌恶的谗佞之人，然后再劝君主行礼治，这样岂不是一举两得？然而，他却并没有这么做。由此可见，在私下里，此时的晏子与梁丘据之间的关系已然比较融洽了。另外，《谏上第六》载，“梁丘据入歌人虞，变齐音”，让景公沉迷其中，“夜发不可以朝”。晏子认为“乐亡而礼从之，礼亡而政从之，政亡而国从之”，轻变齐音可能会导致像商纣王那样亡国的严重后果，所以他“命宗祝修礼而拘虞”，但却没有对罪魁祸首梁丘据进行任何惩罚，甚至在其后与景公的谈话中也未提及与之相关的只言片语。可见，晏子在有意无意地维护梁丘据。《问下第二十九》的记载即是两人私交不错的一个证据，晏子对梁丘据曰：“晏闻之，顺爱不懈，可以使百姓；强暴不忠，不可以使一人。一心可以事百君，三心不可以事一君。”在解释自己为何能以“一心事三君”的同时，也是对梁丘据语重心长的谆谆劝导。

如果说以上晏子的劝导痕迹还不是太明显的话，那么《杂下第二十七》中的记述则至为明晰。梁丘据

① 《重而异者第十四》记载，景公说要除掉馋人佞夫，晏子曰：“公不能去也”。

十分敬佩地对晏子说：“吾至死不及夫子矣！”假若梁丘据对晏子心存怨恨，他是断不会发出如此感叹的。晏子答道：“婴闻之，为者常成，行者常至。婴非有异于人也，常为而不置、常行而不休者，故难及也？”即坚持做事常会取得成功，坚持行走常能到达目的地，晏子谦称自己只是个常常做事而不放下，常常行走而不休息的人，并没有那么难以赶上。这其实就是在对梁丘据进行诚挚地教诲，希望他也能依此而行，去成就自己的一番事业。可见，晏子对他并没有那么憎恨，毕竟综观《晏子春秋》全书，梁丘据所谓的“谗佞”特征都表现在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上，他并不是什么大奸大恶之徒，远没有对国家造成巨大的危害。所以晏子也只是劝说景公在政治上远离他罢了，并没有一定要铲除他的意思。此时两人之间的关系甚至达到了比较亲密的程度。梁丘据非常关心晏子的生活，曾“见晏子中食而肉不足，以告景公”（《杂下第十七》），以求得景公对晏子的赏赐。齐景公好像也觉察到了这一点，所以才会派梁丘据为使者赏赐晏子，如“景公赐晏子狐之白裘，玄豹之氍，其贖千金，使梁丘据致之”（《重而异者第二十五》）。正因为晏子与梁丘据保持着如此微妙的关系，所以我们在《晏子春秋》中只看到了晏子在景公面前贬斥梁丘据言行的不端，但在私下里却并没有怎样摒斥他。而遍览全书，更是找不到梁丘据明确向君主进谗言陷害晏子的只言片语^①。

不过，这只是晏子的权宜之策，在梁丘据死后，他便不再顾忌。景公认为梁丘据生前对自己忠爱，欲“丰厚其葬，高大其垄”。对此，晏子坚决反对，他对景公说：“四封之民，皆君之臣也，而维据尽力以爱君，何爱者之少邪？四封之货，皆君之有也，而维据也以其私财忠于君，何忠者之寡邪？据之防塞群臣，壅蔽君，无乃甚乎？”最终说服了景公。于是，景公“罢为垄之役，废厚葬之令，令有司据法而责，群臣陈过而谏”（《谏下第二十二》）。

综上所述，晏子与梁丘据之间的关系大致经历了一个先疏、后亲、再疏的过程。他虽有明哲保身、避灾远祸方面的考虑，但主要还是为了减少平日施政的障碍，增强朝廷的凝聚力，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自有其积极意义在里面。

3. 对自己的家臣严格要求与鼓励并重

如果说晏子对同僚秉持宽以待人、“以和为贵”态度的话，那么他对自己的家臣可就不太一样了。《杂上第二十九》记载了晏子的三条家俗：“闲处从容不谈议，则疏；出不相扬美，入不相削行，则不与；通国事无论，骄士慢知者，则不朝也。”也就是说，清闲居家时从容不迫却不谈论道义，就被疏远；出门不相互赞扬美德，入门不相互砥砺品行，就不会被亲近；通达国事却不议论，而又傲慢智士，就不被待见。由此可见，晏子对家臣的要求相当严格。他认为：“为禄仕者，不能正其君”（《杂上第二十八》），自己不是供人饮食的主子，所以不能供养这种人。比如高纠，即使殷勤侍奉了晏子三年，因没有匡正过主人的过失，最终难逃被辞掉的命运。

除了严格要求以外，如果家臣能够及时认识并改正自己的错误，晏子还会给予奖赏，以资鼓励。《杂上第二十五》载，晏子的御夫常常“拥大盖，策驷马，意气扬扬，甚自得也”，其妻深明大义，劝说他要向晏子学习，谦虚谨慎，只有这样方才对得起自己的八尺之躯。御夫听之，深自抑损，晏子知道后，破格“荐以为大夫”^②。

另外，对于老家臣言语上的不当，晏子只是谦逊地加以纠正，并不指责他的过错，从而避免了可能引起的不快。如晏子在为父居丧之际，“粗衰，斩，苴经带，杖，菅屨，食粥，居倚庐，寝苫枕草”（《杂上第三十》）。家老告诉他，这不符合大夫为父服丧的礼节。晏子曰：“唯卿为大夫”，即只有正卿才能行大夫的丧礼。对此，孔子赞许道：“晏子可谓能远害矣。不以己之是驳人之非，逊辞以避咎，义也夫！”

由上可知，对于家臣，晏子缓于小节，急于大义，而又赏罚分明。家中之事若能处理妥当，形成一种良

① 《重而异者第二十二》中有馋人向景公上书诋毁晏子的记述，但没有载其姓名，故不能断定是梁丘据。

② 《史记·管晏列传》中亦有相似记载。

好的氛围,那么既可为群臣树立榜样,也可成为自己在政坛上施展抱负的坚实后盾。晏子这种严于律己(包括家臣)、宽于待人的社交态度,正是他历仕灵、庄、景三朝而俱顺,纵横政坛数十载而皆荣的有力保障。

4. 非常之际立场坚定,方式灵活,彰显忠直之本色

晏子在非常时期,处理同僚关系既立场坚定,又方式灵活,这不但彰显了他作为忠直之臣的本色,而且也保全了自己的性命。

崔杼弑庄公后,原本已经辞官不做,“退而穷处”的晏子主动来到崔杼门外,一面以“君民者,岂以陵民,社稷是主”(《杂上第二》),暗示崔杼,庄公无道,即使弑杀也无不可;一面又说“臣君者,岂为其口实,社稷是养”^①,意思是只要为了社稷好,崔氏的行为可以原谅。在自辩的同时,也给了崔杼一个台阶下,有利于保全自己的性命。

如果说这段材料展示出的是晏子处事机敏的话,那么其在与崔、庆盟会上的所作所为则充分体现了他耿直无惧的高洁品质。

据《杂上第三》载,崔杼与庆封相景公,“劫诸将军大夫及显士庶人于太宫之坎上,令无得不盟者。为坛三仞,坎其下,以甲千列环其内外,盟者皆脱剑而入。”但是,晏子不肯脱剑。崔、庆令盟者曰:“不与崔、庆而与公室者,受其不祥!”“言不疾、指不至血者死,所杀七人。”面对如此凶险的形势,晏子大义凛然地说:“崔子为无道,而弑其君,不与公室而与崔、庆者,受此不祥!”在崔杼的威逼利诱之下,他又毫无畏惧地道:“曲刃钩之,直兵推之,婴不革矣。”可见,为了坚持正义,表露对公室的忠诚,晏子当时确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对此,《淮南子·精神训》赞曰:“晏子可迫以仁,而不可劫以兵……君子义死,而不可以富贵留也;义为,而不可以死亡恐也”^[3]。评价甚为精当!至于《论衡·命义》所言:“晏子所遭,可谓大矣。直兵指胸,白刃加颈,蹈死亡之地,当剑戟之锋,执死得生还,命善禄盛,遭逢之祸,不能害也”^[4]。以命运的眷顾来诠释晏子所面临的险恶情势与最终结局则显得有些虚妄。

二、与别国圣贤交:秉持至诚,从实际出发,以社稷利益为重

晏子与别国圣贤交往,秉持至诚的事例主要表现在晏子与晋国叔向和鲁国孔子及其门人之间的交往上。

晏子出使晋国接续婚姻,忙完正事以后,私下里与贤大夫叔向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话题涉及到“对两国均处于季世的评价”,“进不失忠、退不失行”,“正士之义、邪人之行”,“事君之伦、徒处之义”,“以民为本”,“意之高下、行之厚贱”,“蓄、吝、爱之行”,“君子之大义”,“行道与背道之人的品行”,“荣耀的表现”,“明哲保身”等内容,非常丰富。不过总的看来,主要还是体现在治国和修身两方面,这也是当时君子们所热衷谈议的话题。他们的交流为彼此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颇益于今后的为政生涯。

从《晏子春秋》^②和《左传》^③对两人谈话的记述当中,我们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一股诚挚之气。他们相互敬重,彼此欣赏,坦然相待,没有丝毫的伪饰与造作,共同创造了春秋外交史上的一段佳话。

晏子与孔子的交往则与此大不相同。从《晏子春秋》及其它史料的相关记载来看,晏子对孔子非议的多,赞美的少,而孔子对晏子则称许的多,摒弃的少。

晏子曾因儒家学说过于繁琐不实用而非议孔子。他认为孔子“浩裾自顺,不可以教下;好乐缓于民,

①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中也有相似记载。

② 详见《问下第十七》至《问下第二十七》。

③ 详见《左传·昭公三年》。

不可使亲治；立命而怠事，不可使守职；厚葬破民贫国，久丧循哀费日，不可使子民……盛声乐以侈世，饰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礼以示仪，务趋翔之节以观众；博学不可以仪世，劳思不可以补民；兼寿不能殫其教，当年不能究其礼，积财不能赡其乐；繁饰邪术以营世君，盛为声乐以淫愚民。其道也，不可以示世；其教也，不可以导民”（《不合经术者第一》）。在《不合经术者第二》中，他还对儒家倡导的制礼作乐和循哀久葬进行了不遗余力地批评。这主要是由晏子所继承的齐文化轻虚礼、重实践的品格及其本人尚节俭、抑奢靡的思想所决定的。孔子的主张与此格格不入，难怪会遭到晏子的竭力反对。

孔子还曾因怀疑晏子的为人而引起晏子的不满。《不合经术者第三》载，孔子游齐，见景公不见晏子。景公不解，孔子说：“臣闻晏子事三君而得顺焉，是有三心，所以不见也。”晏子听说后，甚为不平，一边对景公解释自己事三君而得顺的缘由：“婴为三心，三君为一心故。三君皆欲其国之安，是以婴得顺也”；一边对孔子进行无情地嘲讽：“婴闻之，是而非之，非而是之，犹非也。孔丘必据处此一心矣。”《不合经术者第四》中亦有相似记述^①。晏子还认为孔子“行一节者也，处民之中，其过之识，况乎处君子之中乎？”（《不合经术者第五》）故比不上大舜，“舜者，处民之中，则自齐乎士；处君子之中，则齐乎君子；上与圣人，则固圣人之林也”。

孔子相鲁，景公患之，对晏子道：“邻国有圣人，敌国之忧也。”晏子为之谋划说，可以“阴重孔子，设以相齐。孔子强谏而不听，必骄鲁而有齐，君勿纳也。夫绝于鲁，无主于齐，孔子困矣”（《不合经术者第六》）。《孔丛子·诘墨》认为“案如此辞，则景公、晏子畏孔子之圣也。上乃云‘非圣贤之行’，上下相反，若晏子悖可也。不然，则不然矣”^[5]。意思是齐景公和晏子惧怕孔子的盛德，但晏子又一贯认为孔子之行并非圣贤所为，这样就前后矛盾了。如果说晏子的言行悖谬，当然可以。否则，就说不通了。

清代学者姚鼐也评价道：

当孔子至齐，以景公之庸懦，岂遽能以季、孟之间，期以待邻之一儒士哉，此必晏子荐之故也；及其不能用孔子，此必晏子所痛，而知其国之将亡不可救者，夫何有反沮孔子事哉？……诸侯裂地以封大夫，此三晋、田齐以后之事，非孔子时国不过赐田邑之制也。子长不能辨而载之《世家》，虽大儒如朱子亦误信焉，是以晏子为世诟，而不知其固非实也。^[6]

马国翰亦曰：

当日者，度（晏子）必揄扬其（指孔子）美，而亟称于君前，景公所以因高昭之主而欲用孔子也。夫欲用而不果用者，公之眩于陈氏也。……当此之时，不惟不能尊孔子，而害将不可测。平仲或有所见闻，不欲故人以虚名之奉而受实祸之及，主文谲谏，意在维持羁旅之臣，卒得保全以去，此固善交之苦衷，所不得已而出之者。吾故曰：即有其事，亦必别有曲折调护之至意，而非忌圣道之行，与病儒效之疏也。^[7]

两人都认为孔子是由晏子引荐给齐景公的，而后或因君主昏庸不能用之，或因避陈氏之祸而保全之。总之，孔子不任于齐，与晏子毫无干系，不害二贤的交往与为人。然而，这些言论均是儒家后学为维护本派圣人而发，其中虽有一定道理，但却多凭空臆测，没有看到晏子与孔子思想的巨大差异。

还是孟天运先生所说更具深意：“齐人历来重视简易务实，故儒家的思想观念可为齐人接受，其繁琐的形式让齐人不能容忍。……晏子对儒家的批评，完全体现了齐传统的特点，集中批评儒家的形式主义。从这个角度来分析，这些批评，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况且，晏子正在齐国力倡节俭，如果重用孔子，讲究繁礼盛乐的儒学势必形成相悖的力量，造成齐鲁文化在这方面的冲突，造成导向上的混乱，这才是晏子反对重用孔子的根本原因”。^[8]于孔宝先生也认为：“晏子所举例儒者之诸多弊端，与尚简易重务

① 在此章中，晏子讽刺孔子“拔树削迹，不自以为辱；身穷陈、蔡，不自以为约”。后世学者因怀疑晏子生前不及见此史实，而认为此则记载为作者虚构，不过这并不影响我们对《晏子春秋》中晏子社交艺术的探讨。

实、尚革新重功利的齐文化传统是格格不入的。……晏子对孔子政治主张所认同的是其思想的内核，而要反对和摒弃的是儒者的礼乐形式或外壳”。^[9]两位先生均以为晏、孔的差异主要在外而不在内，即晏子主要反对的是儒学繁琐的仪式，这与他倡导的崇实尚俭政治主张背道而驰。王绪霞教授则从“此事多书记载，可以相互佐证，而且对立双方都有记载，不是片面之词”、“《论语》中的记载也透露出相关信息”、“孔子也曾是凡人”^[10]等方面考证了晏子阻封、沮孔符合史实。对这些见解，笔者力表赞同。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晏子对孔子的态度主要是由其政治身份决定的。他一向主张“和而不同”，个人对孔子并无成见，之所以在君主面前沮孔，是为了国家利益着想，这也体现了晏子公私分明的可贵品质。

然而，孔子对于晏子，却是赞佩有加，曾多次称许他的言语行为。如“孔子闻之曰：‘晏子能明其所欲，景公能行其所善也’”（《谏上第二十》）；“仲尼闻之，喟然叹曰：‘古之善为人臣者，声名归之君，祸灾归之身，入则切磋其君之不善，出则高誉其君之德义，是以虽事惰君，能使垂衣裳、朝诸侯，不敢伐其功。当此道者，其晏子是耶’”（《谏下第五》）；“仲尼闻之曰：‘星之昭昭，不若月之暄暄；小事之成，不若大事之废；君子之非，贤于小人之是也。其晏子之谓欤’”（《谏下第二十一》）；“孔子闻之曰：‘此言也信矣！善进，则不善无由入矣；不善进，则善无由入矣’”（《问上第三十》）；“仲尼闻之曰：‘小子识之，晏子以一心事百君者也！’”（《问下第二十九》）。此外，《杂上第十六》《杂上第二十一》《杂上第三十》《重而异者第二十七》《不合经术者第四》中也都载有孔子对晏子的高度评价。如果说《晏子春秋》主要以颂扬晏子为主，它所记述孔子对晏子的溢美之辞还不足为信的话，那么其他典籍中的相关言语则可作为旁证。如《孔子家语·辩政》载，“孔子曰：‘晏子于君为忠臣，于行为恭敏。故吾皆以兄事之，而加爱敬’”；^[11]《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亦曰：“孔子之所严事，……于齐，晏平仲”。^[12]

《问下第二十八》和《杂下第二十三》中还记载了晏子对曾子的谆谆教诲。前者主要揭露了那些“上不谏上，下不顾民，退处山谷”所谓隐士们的真实面孔，指斥其不成行义的本质，以此来警示曾子；后者重点论述了君子应“慎隐焯”“慎所修”“慎所湛”，提醒他要慎重地选择自己所处的环境。

不可否认，《晏子春秋》中关于孔子及其弟子的记述多不合史实。作者之所以创作这些内容（主要指晏子不满儒家言行的章节），很可能是自己不赞同儒家的观点，而借晏子之口加以排斥，至于其是否就是墨家传人，在没有足够的证据之前，笔者不敢轻下决断。此外，《晏子春秋》主要突出的是主人公晏子光辉高大的形象，而拿当时作为显学的儒家鼻祖大圣孔子及其著名门人作为陪衬，更能增强效果。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孔子赞许晏子章节的作者属于稷下儒家一派，“他们借孔子对晏子的评赞以扩大这一学派在稷下学宫中的影响，以期受到齐国当局的重视”^[13]。可备一说。

从总体上看，叔向主要从正面衬托晏子的博学多智，而孔子则从正反两面烘托晏子的机敏高洁，这都是为《晏子春秋》的主题思想服务，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该书的文学特性。然而，从晏子对待两人的不同态度中，我们也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他对齐国政治的良苦用心，这也充分体现了他作为一代贤臣的强烈责任感。

三、与布衣百姓交：折节谦逊，救贫济难，深受众人爱戴

晏子对待布衣百姓总是和颜悦色，折节谦逊，救贫济难，如闻已过，立即改正，从而得到了众人的尊敬与报答。

《杂上第二十四》记述了晏子与越石父的故事。晏子在中牟遇见因不免冻饿而卖身为仆的越石父，认为他是个君子，就为他赎了身，一同回到齐国。“至舍，不辞而入，越石父怒而请绝。”晏子不解，使人问明

原因后,马上出来真诚道歉,并“令粪洒改席,尊醯而礼之”,“以为上客”,从而获得了越石父的谅解与尊重^①。对此,君子高度评价道:“俗人之有功则德,德则骄。晏子有功,免人于厄,而反诘下之,其去俗亦远矣。此全功之道也。”

燕国游士泚子午,不远千里来到齐国,欲向晏子献上大可以补国、小可以益身的“三百篇”文章。但是见到晏子以后,却因为惊恐而说不出话来,“晏子假之以悲色,开之以礼颜,然后能尽其复也”(《杂上第二十六》)。作为一国之相,能如此礼贤下士,实属难能可贵。这件事情,还引起了晏子的深刻反思,使他意识到由于身处高位,自己可能失去了很多与齐国贤才交往的机会。以此为鉴,下不为例。

晏子不但善待别国的君子贤人,对本国的奇士人杰也热心周济,从而得到了他们的报答。其中,北郭骚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他曾因贫困不足养母,向晏子借粟,晏子慷慨解囊予以救助。后来,晏子被景公怀疑而出奔,北郭骚及其友人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为晏子辩白,终让景公幡然醒悟,请回晏子(见《杂上第二十七》)。晏子也为自己曾经误解北郭骚而深深自责。

另外,晏子不纳工女,劝谏景公不要纵欲轻诛,赦免骇鸟野人、犯槐者、斩竹者、断雍门之樗者等等,这些事情都赢得了百姓的尊重与爱戴。

晏子与布衣庶人之间的关系,不但体现了他的招贤纳士思想,更展示出了其“以民为本”的政治家情怀。

四、结语

作为一国之相,要想把国家真正治理好,就必须凝聚起社会各阶层的力量。晏子一生都在为此呕心沥血,故其社交思想是整个思想体系得以顺利施行的重要保障。对待普通臣民,晏子的社交思想体现了“和而不同”原则;对于损国利己之辈,晏子或与之周旋,或态度鲜明地与之划清界限,以保国全民。这些无不体现了他坚贞高洁的个人品质与作为“社稷之臣”所担负的神圣职责。晏子的社交方式虽灵活多变,但其目的却坚定不移,一是尽可能团结好所有群体,安定社稷,扬威诸侯;二是明哲保身,避灾远祸。前者是最主要的。张继先生认为“晏子的整个思想体系都是以明哲保身的为人处世哲学为基础的”^[14],这贬低了晏子在历史上的作用与地位,与事实不符^②,有失公允。

晏子的不懈努力最终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但让自己荣显三朝,获得了同僚的尊重,贤人的理解,百姓的爱戴,而且使齐国数十年间“外无诸侯之忧,内无国家之患”(《问下第十二》)。对此,清代史学家马驥给出了中肯的评价:“(晏子)身处乱世,显名诸侯,齐国赖以安”^[15]。

虽然晏子已经逝去两千多年了,但他高妙的社交艺术及思想仍然值得今人借鉴。

参考文献:

- [1]金良年. 论语译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46.
- [2]李梦生. 左传译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 [3]何宁. 淮南子集释[M]. 北京:中华书局,1998:539.
- [4]王充(著),张宗祥(校注). 论衡校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28.
- [5]傅亚庶. 孔丛子校释[M]. 北京:中华书局,2011:393.
- [6]姚鼐. 惜抱轩诗文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9.
- [7]马国翰. 玉函山房文集[M]//《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 清代诗文集汇编.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126.
- [8]孟天运. 论晏子在齐文化中的历史地位[J]. 管子学刊,1999(3):42.

(下转第 109 页)

① 《史记·管晏列传》中也有相似记载。

② 这从本文对非常之际晏子处理与崔杼之间关系的论述中即可看出。